

苏州顾氏过云楼往事记略

(下)



顾文彬故居,现为位于干将西路的风光三轮车服务有限公司

怡园画社

以过云楼收藏为依托,在怡园开展的各种文化活动中,毕竟以书画活动最为主要,其对后世的影响也特别巨大。

苏州是文化古城,书画艺术传统深厚,元、明、清以来,名家辈出。到了晚清,当时苏州最有影响的书画界精英常常在过云楼临画,在怡园聚会,逐渐孕育产生了画社的组织,称怡园画集或称怡园画社,两称均见诸文人笔下。这样订有章程规约的画社组织,在苏州历史上尚属首创。吴大澂被推举为怡园画社社长,光绪十四年(1888),他实授河道总督,加头品顶戴,后因母丧归故里。

当时苏州有成就的代表性画家都汇聚于怡园画集,后来因为上海开埠,参加怡园画集的画家中的许多人到上海发展,成为海派画家,其中最出名的便是吴昌硕,他成为海派画家的领袖人物。

因为吴大澂、顾若波、任立凡、吴昌硕、金心兰等先后去世,吴昌硕移居上海,延至宣统元年(1909),怡园画集活动逐渐停顿。

到了1918年,颜文樑、杨左石等人发起举办“苏州画赛会”,联合展出中国画、西洋画,这也属画坛首创。第一次画展于1919年元旦在万寿宫(今苏州市人民文化宫市老年大学校址)展出。顾鹤逸四子顾公柔当然是中坚分子,负责组织国画作品参展,参展国画家有吴昌硕、顾鹤逸、刘临川、颜纯生、吴子深、顾公雄(顾鹤逸三子)、顾公柔、顾彦平(顾鹤逸之侄)、樊少云、陈伽仙等,西洋画家有:胡粹中、朱士杰、黄觉寺、陈涓隐等,书法家有余觉、朱梁任、张一白、蒋吟秋等。

画展获得成功,进而成立“苏州美术会”,作为常设机构。1937年,因日军进犯苏城,苏州美术会停止活动。

1930年5月,顾鹤逸逝世,为纪念先人,顾彦平发起,重组怡园画社,时在1931年,参加者除顾氏后人:顾彦平(则正)、顾公雄(则扬)、顾公硕(则口)、顾季文(笃亮)、顾荣木(笃瑾)外,还有徐口秋、朱梅口、丁惕予、吴诗初等20多人,其中不少是画坛新人。

在此之前,还有成立于1930年初的“东方美术会”,主办者为吴辟疆、顾荣木(顾鹤逸长孙)等,参加者有樊伯炎、蔡震渊、王选青、潘博山,以及女画家樊颖初、樊诵芬、贝聿昭、彭萃英、殷绥贞、朱青薇等20多人,均为年在20岁左右的青年画家。

顾彦平发起成立的怡园画社,晚于东方美术会,却为第二代,被称为小怡园画社,而东方美术会为第三代,则被称为小小怡园画社。

这就是顾氏家族自清末至日军侵华战争以前,依托过云楼的收藏以及怡园这一活动场地,在苏州所展开的一系列以书画为中心内容的文化活动。

过云楼藏品饱经磨难

百余年来,中国战乱频仍,过云楼珍品命运多舛,饱经磨难。

1937年抗战前夜,眼看战争要打响,顾家人紧急商讨对策,书

画怎么办、人怎么办、家怎么办,逃难到哪里去?经反复研究,最后决定逃到上海租界。他们先把家藏书画中最精华部分存入上海租界的银行保险库,其余部分只能仍旧藏匿在家中。他们在朱家园住所的天井里挖了一个地窖,地窖有一人多高,面积有10多平方米,把一部分不能运往上海的书画密封在白铁皮箱中,藏入地窖。8月16日,日寇投奔苏州的第一颗炸弹,炸毁了朱家园顾家大厅,顾公雄、顾公硕及家人连夜逃离苏城,分别暂时避居农村,然后通过亲友帮助,辗转到了上海租界。

苏州沦陷后,顾公雄、顾公硕(顾鹤逸幼子)在朱家园的住所被日本兵搜查了7天,顾公柔所居的天津别墅则被搜查了整整15天,正所谓掘地三尺。等局势稍稍平静后,顾家人回苏州探视,发现自己的家被日寇践踏得满目疮痍,放在楼上书柜中不及带走的字画遭日寇翻箱倒柜抢掠,被搜出的字画卷轴堆积一地,而字画蕊子全被挖走;那些来不及带走沉在井里的铜器也全部不知去向。

待抗战胜利,顾家人重返家园,发现地窖虽未被日寇发现,但却已进水,变成了水窖,白铁皮箱浸润在潮气中,箱体生锈,白铁皮箱中的书画霉变,损失惨重。

终于盼来了新中国,顾公雄萌生了将书画收藏捐给国家的想法。1951年,他临终前对家人倾吐蕴藏心底的愿望——将书画捐赠给国家。他病逝后,顾公雄的夫人沈同燧及其子女顾笃口、顾榴、顾佛、顾笃璋、顾笃球,首次将所藏部分书画捐赠国家。1959年,沈同燧及其子女将余下的书画再次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二次捐赠,共计393件书画、明刻善本和罕见稿本10多部。书画以宋元以来的著名文人画家为主,名家真迹不胜枚举。1959年3月30日,《人民日报》刊发消息《沈同燧献出一百多件珍贵书画给上海博物馆》。

顾家捐赠的珍品极大丰富了上海博物馆的馆藏。上海博物馆自称正是苏州顾家的书画与潘家的鼎(军机大臣潘祖荫珍藏的大克鼎、大孟鼎,有天下三宝有其二之说,1951年潘家后人捐给上海博物馆),撑起上海博物馆的半壁江山。

顾鹤逸的幼子顾公硕,对共产党早已有一定认识,抗战胜利后,他目睹国民党的腐败,常对友人说,中国人的希望在延安。1952年,他被聘为苏州市文联委员、市文联国画组组长、市文联第一至第三届执委、五届政协常委。1960年,苏州博物馆成立,他被任命为副馆长,2年后又兼任苏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

苏州博物馆建立伊始,急需充实藏品,顾公硕带头踊跃捐献,将珍藏的元代王蒙,明代文徵明、唐寅、祝允明、董其昌等传世珍品和清代刺绣等文物124件无偿捐出。

当时,台湾报纸也报道了顾家捐赠书画、古籍善本的消息,全文竟无攻击新中国的词句,这在当时实属罕见。究其原因无它,皆因保护祖国民族文化是海峡两岸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

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苏州,顾公硕之子顾笃璜首当其冲,

被定为苏州三家村之一而被打倒。顾公硕主动请求苏州博物馆前来抄家,以免文物遭“破四旧”毁灭之灾。不料,苏州博物馆造反派及江苏省苏昆剧团造反派同时到达,竟先将顾公硕及其夫人张娴拉到大门外当街批斗,然后才把他家的珍藏全部运走。顾公硕不堪凌辱,当夜离家出走,自沉于虎丘一号桥,留下遗书说:“士可杀,不可辱,我先走了。”他是苏州在文革中遭迫害致死的第一人。

文革结束后,抄家物资发还,但仍有不少缺失。

过云楼藏品的归处

1992年,南京图书馆通过苏州古旧书店向顾氏后人求购过云楼藏书。顾氏后人认为,这些藏品应该有个好去处,以便更好地加以保护与发挥作用。南京图书馆就以极低的价格获得这批善本古籍,交换条件是在南京图书馆辟过云楼藏书室(后来,藏书专室一事不了了之)。但顾氏家属中也有人不同意,所以未能全部入藏。入藏书籍共500余部3000余册,其中宋元刻本及名家抄校本不少。

2008年3月24日,笔者采访了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徐忆农。徐忆农介绍,南京图书馆收购的过云楼这批藏书有一个现成的书目,从书目来看,宋、元、明、清历朝版本都有,包括刻本、抄本、稿本各种类型。“有那么几部是宋元版的,宋元版的书本身就很有价值。”徐忆农说,其中,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辙著的宋版《龙川略志》、宋著宋版的《字苑类编》,入选国务院于2008年3月公布的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2009年8月,顾文彬收藏的《元赵天裕、柯九思、赵原、顾定之、张冲、吴镇六家墨竹卷》《王石谷水竹幽居图卷》两幅珍贵书画,被苏州博物馆永久收藏。其中,前者估价逾亿元。

历经百余年风雨的过云楼藏品,大部分都已无偿捐赠给了国家。精心构筑的怡园连同顾氏家祠,也由顾公硕及其子侄辈联名写信,于解放初即已无偿捐赠给了政府。

关于过云楼陈列馆

现在再说过云楼。20世纪80年代末,在旧城改造中,位于铁瓶巷的顾文彬旧宅虽受到保护,过云楼也得以整修,但因干将路拓宽及人民路改造,顾氏旧宅南向两进被拆除,东侧一落被改建为商业用房,成了沿街非原来的深宅内院,而成了沿街浅屋。西侧大厅目前归风光三轮车服务有限公司使用。至于位于过云楼南院中的五块珍奇湖石、著名的“五岳起方寸”,则早已毁于狂热的大跃进年代,被炼了石灰。

过云楼遗址现在挂着苏州市地下管线管理所招牌。当过云楼修复之初,干将路指挥部与平江区文化馆联手,决定成立“过云楼陈列馆”,并商得顾氏后人顾笃璜同意,出任馆长。他已做好准备,将其所藏有过云楼的文献资料等无偿捐献,提供陈列。不料主办方提出每年需收取房租18万元,而将建的“过云楼陈列馆”应属社会公益事业单位,无此偿付能力,于是只得作罢。

出现如此的结果,大出人们的意料。苏州文化界人士联名上书,呼吁维持原定筹建“过云楼陈列馆”计划不变,并免收房租,作为公益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开放,却迟迟没有答复,这已是20年前的往事了。

今逢盛世,过云楼却依旧物非所用,有热心人旧话重提,仍无结果。谁都明白,过云楼的文化内涵,决非仅在这一古建筑本身,更在于其所蕴含的人文精神。若“过云楼陈列馆”果能成立开放,必将产生深远影响,其效益决不是简单地用直接的经济收入可以估量的。张锺吴 樊宁

早些年曾出版过一部叫《林氏三兄弟》的书,讲述了林彪与堂兄林育英、林育南两位烈士的不同人生道路。鲜为人知的是,林彪的同胞兄弟林向荣,也是解放战争中太原战役时牺牲的一位烈士。虽不及那两位堂兄声名显赫,但林向荣也为新中国的成立,洒尽了最后一滴血。

林彪之弟林向荣牺牲后的政治风波

林彪兄弟姊妹共六人

林彪兄弟姊妹六个,除年龄最大的姐姐和年龄最小的妹妹外,中间是四兄弟,他们从大到小分别叫庆佛、育容(林彪)、育菊(林程)、向荣。这四兄弟字号按照“正、大、光、明”四字排序,林彪字“祚大”,而林向荣字“祚明”。林彪与林向荣都与其母亲容貌相似,但二人性格却迥异:林彪沉默好静,而林向荣活泼好动。

大革命时期,林彪就离开家乡南下广州,成了黄埔军校的第四期学员,此后长时间没有和家人联系。1937年初,林育菊曾经到了延安并见到了二哥哥林彪,林彪时任红军大学校长,他向弟弟介绍了当时全国的革命形势,并且送给他一份“红大”的招生简章,让他带回去广为宣传。在家中的林向荣知道了二哥的音讯特别是看到这份简章后欣喜异常,立刻表示要去延安参加革命。他还召集了另外几个青年一行9人一起上路,其中还有林彪的侄子林欣然、外甥陈得之。1938年林彪出国病休之后,林向荣已成为抗日军政大学的第四期学员。他毕业之后分配到晋察冀边区第三军分区。

到解放战争开始之后的1946年6月,林向荣已经担任晋察冀军区独立第五团的团长了。当时我父亲朱卿云是他的搭档、该团的政委。从1941年起,林向荣就与我父亲并肩战斗。1949年2月,他们所在的华北军区第一纵队第二旅在顺义改编为第二十兵团第六十六军第一九七师,我父亲任师政治部主任,林向荣则任该师五九〇团的团长。

林向荣倒在诈降敌人枪下

1949年3月,六十六军奉命参加解放太原的会战。六十六军于3月12日从驻地出发,3月20日到达太原北郊。当时成立了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委的太原前线指挥部,彭德怀也亲临前线指挥。

4月19日晚,六十六军进入阵地,准备拂晓开始行动。半夜里,一九七师阵地前面向阳镇的守敌投诚,于是一九七师兵不血刃占领了阳曲镇。次日凌晨3点,一九七师从阳曲镇出击,直扑设在黄花园沟南的敌暂编三十九师师部,当场击毙了试图顽抗的敌师长刘鹏翔。全师乘胜向敌纵深发展,向南攻占了古檀、新店,接着与一九八师会合,继续沿铁路向南横扫。

两个小时,部队开始进攻化工厂,这是国民党军北郊工厂防线的核心据点。就在此时,出现了蹊跷的情况。对面的敌人打出了白旗,并用扩音机喊话:“我们同意休战,请贵军师级长官前来商谈受降事宜……”

此时,林向荣主动请缨,他认为敌人完整投降的可能性不大,应由他带领一排人前去试探,万一敌人施展诡计我们也能随机应变。师领导同意了他的意见,并叮嘱整个部队:随时准备出击接应!

一行人出发了,林向荣与警卫员各自骑在马上,走在最前头。这段时间好像特别漫长,大家心里都忐忑不安。突然间,敌人阵地那边响起了猛烈的枪声,果然有诈!大部队随即出击接应,但立即被敌军密集的火网所阻,伤亡严重,不得不停止进攻。到了21日凌晨,上级指挥部调来了炮兵增援,一九七师在炮火的掩护下,采取两面夹击的打法,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苦战,彻底摧毁了化工厂的敌人工事,歼灭了守敌。

这时大家才发现,敌人有意把林向荣和他那一排人引到了一个三面受到交叉火力威胁又无险可守的一片“绝地”中。据一个侥幸生还的战友说,虽然面临绝境,林团长仍试图反击,交火中他的警卫员先中弹

倒下,就在林团长上前救护时,也被机枪子弹击中,当场牺牲。

出征太原前,当部队还在顺义时,林彪出于手足之情,把这位胞弟接到北平城内住了几天,这是他们兄弟参加革命后的首次相聚。林向荣回到部队后说,哥哥看到他的成长十分高兴,还勉励他今后再立新功。没想到这竟成了他们的诀语。按照部队中“三十、团”(即超过三十岁的团级干部)才能批准结婚这一规定,林向荣牺牲时还是孑然一身。

一九七师领导得知此事后十分震惊、痛心,主持师政治部工作的我父亲更为失去这位多年相伴的战友难过至极。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林向荣的挺身而出代替了他。由父亲起草的师党委发给林彪的慰问信中,全体领导向林彪表达了哀悼之情,并且检查了我方过于大意对同志爱护不够的责任。林彪立即回了信:为革命而牺牲完全应该,这完全可以理解!当时林彪这种坦然、大度的处理方式令所有人感动不已。

林彪一直未将弟弟林向荣牺牲之事告诉父亲,总是说他出国学习去了,不料林立果17岁时在他爷爷面前不经意地说了一句:“我叔叔1949年就已经在太原牺牲了……”老人顿时崩溃了。

文革时林彪借此事整人

到了“文革”时期,当年林向荣牺牲一事又被林彪一伙重新提起。1967年3月29日,徐向前被宣布接受审查。4月1日上午,叶群对吴法宪等人说:“林总的亲弟弟林向荣同志死在太原战役中,据说他死得很蹊跷,你们要为首长分忧。”李作鹏又传达叶群的话说:“首长认为,徐向前在太原战役之前和彭德怀的接触不是偶然的,可以专门审查一下彭德怀,去秦城调薄一波来问,赵尔陆已死,周士第还在,可以问周,聂荣臻也是前委的人也要问到。”林彪一伙布下了一张大网,要借此事整一批老干部。徐向前当时毫不知情,周恩来也不知道这件事,就连江青、张春桥也不知道这件事。

1967年4月8日,外调工作组回来向叶群、吴法宪汇报:“林向荣死于机关枪子弹,左前胸和腹部各中弹一枚,当场牺牲,没有后背中弹的记录。”由此看来并无可疑之处。4月11日,中央召开批斗徐向前的会议,吴法宪等人质问徐向前此事,徐向前勃然大怒,回答:“这是早有定论的事,你们又翻腾出来居心何在?”会场一片混乱。周恩来当即制止再议此事。江青也问吴法宪:“这是谁搞的专案?中央一、二专怎么不知道?富治同志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总理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不请示中央?不上联席碰头会?”叶群说:“这是一件和彭德怀有关的事,林总事前知道。”

1968年10月18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对林彪说:“战争年代谁家不杀人?我的两个弟弟都死了,他们也都是烈士嘛。”林彪表态:“主席一门忠烈,是我们的表率。”林彪死后,毛泽东对周恩来、徐向前说:“林彪、叶群他们搞了一个专案,我事前不知道,总理也不知道,是江青告诉我的,我早就说过战争年代谁家不杀人,我的两个弟弟、六个亲属都死了,我还能找谁去查?这件事不准再提,都是林彪背着我们搞的。”至此,专案才算完全平息。

我父亲生前总说:“我将来最终要和这两个战友去做伴,一个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另一个就是林向荣,他们是我一生永远不能忘记的人。”现在,他们已全都安息在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里了。

朱岩 \ 文 摘自《党史博览》